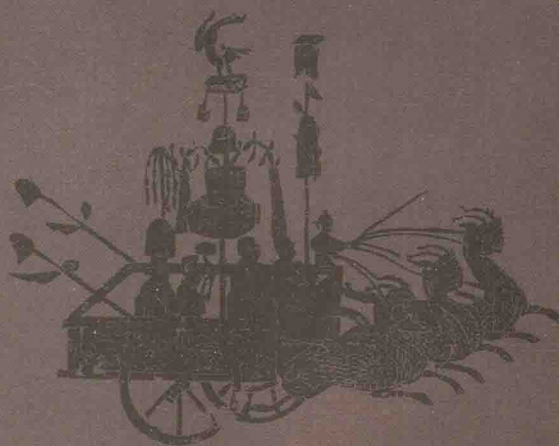


《尚书》： 行政之魅力

◆ 曾宪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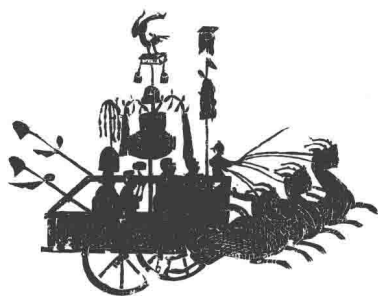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06YB30）
湖南省第15届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立项
2011年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尚书》：行政之魅力

◆曾宪年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尚书：行政之魅力 / 曾宪年著.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 - 7 - 5648 - 0565 - 4

I. ①尚… II. ①曾… III. ①中国历史—商周时代②尚书—研究
IV. ①K221.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1740 号

尚书：行政之魅力

曾宪年 著

◇责任编辑：何海龙 陈海英

◇责任校对：黄 晴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15. 75

◇字数：275 千字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48 - 0565 - 4

◇定价：26. 00 元

自序

—

《尚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我国夏商周时期有作为的君臣治国安邦行政言论、活动的记录记载及文告等历史文献汇编。夏商周时期上接原始社会末期，下启封建社会初期，横跨两千年时空，属中华文明的远古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除《尚书》外，就只能依靠考古新发现来给予补充和完善，今天研究和考察夏商周历史，《尚书》显得特别的弥足珍贵。

《尚书》因时代久远，文字、语音、语法差异大，语言古奥生僻晦涩，素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难读难懂的特点。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感叹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便是“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因此，几千年来我国治《尚书》者众，出版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并已形成专门学问——“尚书学”。但其对《尚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校勘、章句、训诂、义疏、注疏、辨伪等方面，正如刘起钊先生在其《尚书学史》著作中所指出的：“但所有这些成就，统统只限于《尚书》原篇文字本身和文句含义及所载历史事实与人物等等的有关问题，并没有深入探索《尚书》所含蕴的深刻思想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

揭示《尚书》深刻思想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千百年来，众多治《尚书》学者中亦不乏真知灼见者：《荀子》云“《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朱熹在《朱子语类》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朱熹弟子蔡沈奉朱熹命“求圣人之心”，作《书集传》。他在《书集传》自序中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这些论述虽独辟蹊径阐述《尚书》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但仅止步于一般的概括，正如孔子批评其学生子夏读《尚书》“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

未入其中”一样，未能深入全面揭示《尚书》深刻思想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随着人类社会跨入新的世纪，《尚书》研究进入从学科的角度研究《尚书》的新阶段，但著作仅局限于从哲学（伦理学）、历史或文化的角度研究《尚书》，且数量少，从行政学角度研究《尚书》则属凤毛麟角。

二

正因为千百年来《尚书》研究存在上述历史和现实，也因为千百年来历代研究者已经揭示《尚书》“长于政”、具有“政事之纪”的特性，我于2005年开始从行政学的角度研究《尚书》，试求《尚书》“心之要”。几年来，我阅读、研究《尚书》，毕竟自己才疏学浅，玄思和悟性不及万一，因此，面对“佶屈聱牙”的《尚书》，真有“前有高岸，后有深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然又为《尚书》所蕴涵的中华民族先人们修身治国安邦行政的智慧、哲理所深深吸引，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悉心尽志以入其中，不敢有半点懈怠，正如韩愈在其《进学解》所说：不但“口不绝”、“手不停”，而且心不断、思无穷，专注于《尚书》，“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深入探索“二帝三王”修身治国安邦行政之“心法”，力求入其中，见其里，握其道，得其心，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几年来，读《尚书》，研究《尚书》，我以现代行政学理论为切入点，抓住我国古代国家管理中政治、经济、法制三条主线，运用现代行政学的一般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尚书》各篇所体现的行政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类，取精华弃糟粕，理论联系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行政管理实际，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力求全面深入诠释《尚书》，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拓展我国现代行政学理论体系，为现代行政学理论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开辟广阔的领域，实践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行政文化，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事业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历时五年，《〈尚书〉：行政之魅力》书稿基本完成。书稿从《书》者，政事之纪也；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的行政哲学；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行政法规；五刑有服，惟明克允的刑法制度；任土作贡，弼成五服的经济政策；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德治主张；慎厥身修，庶明励翼的修养观等八个方面研究和阐释《尚书》所蕴涵的行政思想，认为《尚书》是对我国夏、商、周时期朝代更替、社会发展原因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全面体现着我国古代行政思想和行政理论的源远流长。

《〈尚书〉：行政之魅力》从行政学角度对《尚书》进行全面深入阐释

的同时，着重提炼四个观点：一是提出《尚书》是儒家思想之源，其所蕴涵的治国安邦行政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其精华是维护中国社会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正常有序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认为《尚书》所阐述的“水、火、木、金、土”五行观和“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是儒家（行政）哲学的思想内核，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哲学基础；三是提出原始儒家（行政）思想不仅重视以德治国，讲仁、义、礼，更重视依法治国，有完善的法规和司法制度，还主张司法独立、行政不干预司法；四是阐述《尚书·禹贡》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刊旅浚源”划分九州的地理学著作，还是我国最早按照“庶土交征，底慎财赋”的经济学著作。这四个观点的提炼和提出，赋予《尚书》全新的行政学意义，能促进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行政文化传统，一扫以往人们研究《尚书》望而生畏的心理，引导人们去认识研究《尚书》，吸取《尚书》精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也能一改长期以来人们对儒家、儒家思想认识的单一和片面，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完善和认识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尚书〉：行政之魅力》从行政学的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尚书》的深刻思想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还《尚书》本来面貌，也体现了两千五百余年前孔子收集编辑《尚书》，以《尚书》为教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学成后能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行政文化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初衷。如果说《〈尚书〉：行政之魅力》著作具有一定的开拓和创新的话，那么这些许开拓和创新就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并且这些许开拓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从事《尚书》研究的学者、大家锲而不舍地对《尚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训诂、辨伪、注释而产生的丰硕成果，就没有《〈尚书〉：行政之魅力》的问世。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就是雅斯贝尔斯著名的“轴心时代”论。这“轴心时代”论就是要求人类在今天的发展进步中，特别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碰到问题和挫折时，应重视对古代传统思想文化智慧的温习与发掘，经常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发掘先人们几千年前碰到问题和挫折

时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今天，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行政工作漫无头绪时，《尚书·皋陶谟》篇把古代行政工作概括为“在知人，在安民”两件事，并强调“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当行政用人出现差异而导致工作失误和失败时，《尚书·立政》篇强调行政任人首先应“三宅三俊”严格考察，其次应“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勗相我国家”；当今天人们呼吁司法独立，行政不干预司法时，《尚书·立政》篇指出行政领导应“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即行政不要干预司法，应尊重司法独立；同时，如何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尚书·康诰》篇强调行政领导关心百姓要做到“若保赤子，惟民康乂”；领导者面对各种挑战，《尚书·盘庚》篇要求领导者应向盘庚学习，有“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即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的胆量和勇气；《尚书》强调领导者只有“慎厥身修”、“允迪厥德”，才能为“协和万邦”作出贡献等等。这些思想和智慧无疑是我们立足今天面向未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能给我们今天的行政事业和工作以深刻的启迪和借鉴；它能引导我们于纷繁复杂的事物和现象中妥善处理好各项行政工作，为今天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事业作出贡献。

司马迁说得好：“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就是告诉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政治多极、文化多元、价值多样的世界，我们要立足根基，就应了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就应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当做一面镜子，举一反三，不能照搬照抄，而要根据今天的实践，去粗取精，去芜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和智慧中继往开来不断创新。这也是《〈尚书〉：行政之魅力》著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其目标和任务就是对《尚书》所蕴涵的中华民族有价值的行政思想和行政文化进行梳理和诠释，为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的行政学说、新的行政理论，指导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实践作出贡献。是为序。

作者

2011年6月

目 录

绪论 《书》者，政事之纪也·····	(1)
第一节 《书》、《尚书》与《今文尚书》·····	(1)
一、《书》与《尚书》·····	(1)
二、《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	(5)
第二节 孔子、《尚书》与儒家·····	(11)
一、孔子与《尚书》·····	(11)
二、《尚书》与儒家·····	(17)
第三节 行政、行政学与《尚书》·····	(27)
一、行政、行政学与《尚书》·····	(28)
二、《尚书》：政事之纪·····	(32)
 第一章 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41)
第一节 钦若昊天，天人合一·····	(41)
一、钦若昊天，敬授民时·····	(42)
二、天人合一，敬天保民·····	(47)
第二节 惟明克允，神人以和·····	(54)
一、无康好逸，乃其义民·····	(55)
二、天寿平格，作汝民极·····	(58)
三、纯佑秉德，往敬用治·····	(60)
四、典乐兴教，亦克用劝·····	(64)

第三节 允恭克让，格于上下	(66)
一、允迪厥德，谟明弼谐	(67)
二、纳于百揆，百揆时叙	(70)
三、烈风雷雨，克敬于和	(71)
第二章 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的行政哲学	(75)
第一节 水火木金土，远古物质雏形	(75)
一、水火木金土，五星与五行	(76)
二、水火木金土，物质与五行	(78)
三、水火木金土，行政与五行	(82)
第二节 水火木金土，物质的联系与发展	(87)
一、五行与物质的普遍联系	(87)
二、五行与行政的普遍联系	(89)
三、五行与五行学说的联系	(91)
第三节 水火木金土，古代行政哲学基石	(96)
一、天帝所赐，神秘孕五行	(96)
二、五行，古代行政哲学的内核	(99)
三、五行，对古代国家行政的影响	(102)
第三章 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行政法规	(105)
第一节 天授君权，彝伦攸叙	(105)
一、天授君权，洪范九畴	(105)
二、君权天授，彝伦攸叙	(109)
第二节 念用庶征，规范皇权	(111)
一、五行五纪，惟皇作极	(111)
二、岁月日时无易，家用平康	(114)
第三节 皇建有极，以为天下王	(118)

目 录
SHANGSHU XINGZHENG ZHI MEILI

一、无偏无陂，遵王之道	(118)
二、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122)
三、三人占，从二人之言	(125)
第四章 五刑有服，惟明克允的刑法制度	(131)
第一节 五刑五用，象以典刑	(131)
一、兵刑合一，五刑有服	(132)
二、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135)
第二节 惟良折狱，有德惟刑	(138)
一、非佞折狱，惟良折狱	(139)
二、有德惟刑，明德慎罚	(141)
第三节 荒度作刑，惟作天牧	(145)
一、刑罚世轻世重，轻重诸罚有权	(145)
二、不率大夏，兹义率杀	(149)
三、勿误于庶狱，惟有司牧夫	(152)
第五章 任土作贡，弼成五服的经济政策	(155)
第一节 庶土交征，成赋中邦	(155)
一、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155)
二、庶土交征，泽被后世	(158)
第二节 刊旅涤源，任土作贡	(160)
一、任土作贡，庶土交征	(160)
二、刊旅涤源，经启贡道	(163)
第三节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165)
一、弼成五服，甸侯绥要荒	(165)
二、五服宾从，声教迄四海	(168)

第六章 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德治主张	(173)
第一节 允迪厥德，以德配天	(173)
一、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173)
二、纯佑秉德，以德配天	(178)
第二节 知人则哲，立政惟贤	(184)
一、知人则哲，庶绩其凝	(184)
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189)
三、立政惟贤，百工熙哉	(192)
第三节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197)
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197)
二、若保赤子，惟民康乂	(200)
第七章 慎厥身修，庶明励翼的修养观	(204)
第一节 克明俊德，协和万邦	(204)
一、位在德元，格于上下	(205)
二、知行合一，光被四表	(210)
第二节 桀纣坠厥命，嗣王监于兹	(215)
一、天为民求主，桀纣坠厥命	(215)
二、鉴于殷夏，敬天保民	(220)
第三节 慎厥身修，天命自度	(226)
一、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227)
二、君子所其无逸，知稼穡难乃逸	(229)
三、责人斯无难，受责如流难	(232)
参考书目	(237)
后记	(239)

绪论 《书》者，政事之纪也

《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①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它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至封建社会初期，横跨整个奴隶社会，记载了我国远古夏、商、周时期一系列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和历史事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远古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状况。翻开《尚书》，我们就像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时空，来到中华民族的远古时期，观义、观仁、观诚、观度、观事、观治，吸取智慧和力量，然后知成败存亡得失，尊尧舜文武，戒桀纣荒淫。

第一节 《书》、《尚书》与《今文尚书》

《尚书》最早叫做《书》。在《尚书》的形成过程中，不同于其他历史古籍，它有着一个收集、编纂、遗失、增删、改动、辨伪的漫长历史过程。

一、《书》与《尚书》

自远古以来，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设有各种史官，这些史官专门负责记录历代统治者的言行和事迹。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就有担

^① [秦] 博士伏胜（撰），[汉] 郑玄（注），[清] 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132页。

任贞卜的官员，这些担任贞卜的官员就是我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专门记录殷商王朝大事和殷王行政言论和行动的史官。《礼记·玉藻》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①《汉书·艺文志》指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②这两则史料真实地记载我国古代在统治者身边设有史官职位，其职责是专门负责随时记录统治者的“言”和“事”。同时，这里所说“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说明“君举必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供统治者借鉴和注意。因此，历史上把统治者的“言”记下来，按篇保存，就积累成讲话记录或文告的汇编；把统治者的“事”记下来，按月、日排列，就积累成编年大事记。汇编、大事记这两种形式在古代都叫做“书”。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指祭祀，戎是指战争，说明早期国家的行政管理是围绕着祀与戎来开展的。在我国远古时期，国家大事归根结底，都要通过祭祀来进行，通过祭祀来祈求神灵的佑护。祀在上古时期适用的场所很多，祭祖、祭神明需要祀，立君、迁徙、建都需要祀，征战、结盟需要祀，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祀却为国家大事中最为重要而又最为频繁的活动。各种祭祀活动都需要拟订呼告神明的诅咒、祷告、祝禳之辞，战争中的祭祀活动更需要拟订告众之辞以及盟誓之文。所以，制祀最初就成为巫祝卜宗之类人员的专职。巫祝、史官制作有关国家祀与戎的册、典、祝、命等文书就是记录当时的“国之大事”，为君王大臣提供借鉴，为当时统治阶级神教和行政服务。《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③之说。这些都说明我国早在夏、商时期制“典”作“册”并予以保存，就已经形成传统了，这是早期《书》的雏形。

西周时期，史官的职责随着统治阶级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得以不断发展和扩大。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史官拟订册命、祝文、盟书，记载大事要事、帝王言行的行为已相当普遍，周代称“史”的官职，就有大史、内史、小史、外史、御史等，他们的职责大都涉及国家、邦国大事、君王言行等文辞记事。到了西周末和春秋战国时，史职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多了，出现了不同体裁的不同名称，计有：“语”，如《国语》；

①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01页。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5页。

③ 顾颉刚、刘起钎：《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17页。

“志”，如《周志》；“世”，如《世本》；“谍”，如《谍记》等等。而编年大事记，各国则各有不同名称，如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梲杙》等。《墨子》把它们综称为“百国《春秋》”。至于君王大臣们的讲话、记录或文告的汇编，便逐渐专用“书”这一名称，并按王朝加以汇编，分别称为《夏书》、《商书》、《周书》。

从以上我们所叙述《书》的起源来看，在我国远古早期所说《书》具有普遍的意义。事实也是这样，我国远古早期所称说的《书》是与《诗》、《礼》、《乐》等典籍相区别意识产生后，人们以类的意义给以分别后才形成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云：

赵衰曰：“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①

这里“敦”为“惇”的假借字，《说文解字》说：“惇，厚也。”敦《诗》、《书》，即以《诗》、《书》为厚，以《诗》、《书》为贵。而“《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是给予《诗》、《书》、《礼》、《乐》的内容、价值及作用以崇高的评价，是最早对《书》进行宏观评价和诠释的文献。鲁僖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633年，这里以晋国赵衰之口吻提及《书》，而且是与《诗》、《礼》、《乐》一起提出，说明《诗》、《书》、《礼》、《乐》一起称谓，早在西周末春秋初就存在。蒋善国先生在其所撰《尚书综述》一书中，列举《墨子》说“‘……著在《周之春秋》。……以若书之说观之……’、‘著在《燕之春秋》。……以若书之说观之……’、‘……著在《宋之春秋》。……以若书之说观之……’、‘著在《齐之春秋》。……以若书之说观之……’（《明鬼下》）所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都叫作‘书’”。后指出：“可见到了春秋战国间，一面把一切简策叫做‘书’一面把记言的简策也叫做‘书’。‘书’的名称，已有共名和专名的分别，含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②这里，蒋善国先生简单地阐述“书”的缘起后，又根据当时对“书”的称谓的状况指出，“书”在春秋初期就有共名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5页。

②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和专名的分别，含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我们的理解是，所谓“共名”就是“书”的泛指，泛指当时存在的一切简策，因而“书”具有广义的意义；所谓“专名”就是“书”的专指，专指当时存在的具有某一类意义的简策，所以这一类“书”具有狭义的特征。

历史事实也说明，在西周末春秋时期，《书》指的就是当时存在的具有某一类意义的简策，它已和当时流行的《诗》，成为当时士大夫必读的两种典型读物。虽然儒家的课程是“诗、书、礼、乐”四种，但“礼、乐”只是他们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读本就只有《诗》、《书》两种。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加上《春秋》，成为五种。后《礼记·经解》中说，又加上《易》，成为六种。《庄子·天下》篇列举了《诗》、《书》、《礼》、《乐》、《春秋》、《易》这六种为邹鲁之儒所习，并在其篇中把《诗》、《书》、《礼》、《乐》、《春秋》、《易》统称为“六经”。司马迁在其《史记·伯夷列传》中把《诗》、《书》、《礼》、《乐》、《春秋》、《易》统称为“六艺”。由于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书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统称为“五经”。这里《书》与《诗》、《礼》、《乐》、《春秋》、《易》一起分别作为众多“书”中的其中一类而存在，分别为“书”的专名而只具有狭义的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说《书》“其司（始）出皆生于人”，“《书》，有为言之也”^①，《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②，这诸条文献从不同侧面对早期《书》篇兴起的情况进行了诠释，将上述各条诠释概括起来可知，西周末年和春秋初人们已经意识到《书》之所兴是因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因统治者治国安邦治民的需要而产生，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应该说，《书》是西周末期史官搜掇古往国家政事之言、以古政为借鉴意识的产物。它来源于我国早期巫、史为神教、军旅、行政服务所制作的各类祷告、盟誓、册命之文和历代史官所掌、所传的典、宪之策，以及朝廷、官府出于治政安民的需要而颁布的各种诏令文件，再加上由史官搜集口耳相传而撰写的前代政事之记。自其陆续形成之日起，就始终成为统治阶级史官赞颂治国安邦、鼓励君王大臣勤政爱民的重要工具，并逐渐上升为传统文化之主流，与《诗》、《礼》、

① 荆门市博物馆编译：《郭店战国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② [战国]荀况（撰），张觉校（注）：《荀子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页。

《乐》、《春秋》、《易》一起曾在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共同构成了为先秦时期各诸侯国所依托的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在政治方面，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士大夫多征引《书》文以治政，先秦诸子亦多援《书》以议政，对我国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因为《书》的形成及流传对我国远古时期以来历朝历代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统治者行政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因为《书》源于上古，是上古之书，有人称“上”者“尚也”，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的名称逐渐为《尚书》所替代，尊称《书》为《尚书》。《尚书》之名起始于何时？又是谁最先提出？刘歆在《七略》中说：“《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①认为是欧阳氏今文家首先这样称呼它的；郑康成《书赞》云：“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②认为《尚书》是孔子命名；伪《孔传》则说是“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③认为《尚书》名源自伏生；三种说法，各执其辞，互有冲突，莫衷一是。我们难以判断其谁是谁非，但是我们能从其中得到确切的信息就是，《尚书》是由《书》发展而来，“尚书”一词的意义就是“上古的史书”，是人们对《书》的一种尊崇。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经过上古时期千百年的发展，《尚书》基本完成了由泛指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书，到专门记录国家大事、君王言论的《书》，再到儒家传授的专门记录尧舜以来夏商周三代国家大事、君王言论的《尚书》，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牢笼百代的儒家经典的嬗变过程。

二、《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

《尚书》是我国远古夏商周时期国家行政历史文献汇编，夏商周时期距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由于历史的久远，流传时间的漫长，《尚书》经历了编撰、丢失、发现、增删、补缺、改动的几经反复波折的过程。在汉代，《尚书》的传本主要有两个，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分别简称为今文本和古文本。

《今文尚书》，是秦博士伏生传下来的，伏生名叫伏胜，“生”是古代

①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③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据传伏生曾担任秦王朝的博士官。当秦末战乱时，伏生把《尚书》竹简藏在墙壁里，到战乱平静，社会安定，并废除了秦《挟书律》后，才把竹简从墙壁里拿出来。可是竹简已经断烂毁失了，勉强拼凑只存得二十八篇。伏生是山东人，战乱后，他就用现存的二十八篇《尚书》在他的家乡齐鲁之间教授门徒。有一种传说是，战乱平时，伏生已九十多岁，汉文帝派晁错到他家传习，由他口授给晁错。更有一说是由他女儿转述，然后由晁错记录下来转送到宫廷里。这些传说富于传奇性。事实上，传授《尚书》的是伏生的门徒，他们后来发展成为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在汉武帝到汉宣帝时，这三家先后都立于学官（等于现在的大学，但设在王朝内），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伪《太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把《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三十一篇）这三家虽均源于伏生，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凡立过学官的就成为一家，这样三家各自严于家法和师法，遵守自己这一家的家法和师法，门户之见极深。到汉末，为了统一今文学各家经文文字的分歧，在熹平年间刻石经立于太学，把《尚书》、《周易》、《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刻于石经之上，称《熹平石经》。其中《尚书》用的是欧阳氏今文，而把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在“校记”里。现在我们看到汉《熹平石经》残石的拓片，此石经原残存八千余字，其中《尚书》八百多字。近年又发现残石三段，其中《尚书》可识者一百七十余字，合计将近千字，分属二十三篇。从实物再次证明汉今文及《尚书》今文三家的文字情况，能供我们校勘《尚书》文字及考订史实之用。伏生所存的《尚书》是秦王朝的官方定本，已根据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诏令用秦隶书改写，汉承秦制，隶书仍然是汉代的日常通用文字，所以这个用秦隶书改写的定本叫做《今文尚书》。这三家也就被称为“今文三家”，又因为这个今文本是伏生传授，所以这个今文本又俗称“伏生本”。

《古文尚书》因为其文字是用先秦六国所用篆、籀等字体，因而以《古文尚书》称之。汉代离战国时期还不远，战国时期六国文字不尽相同，所以，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古文尚书》本，先后传闻出现过好几次。其中，最主要的是“孔壁本”，据《汉书·楚元王传》所载，汉武帝末年，分封在孔子家乡的鲁恭王建造宫室，在拆毁孔子故居的墙壁时，发现墙壁中藏了几部先秦典籍，大概是孔子的后代为了免于秦时战火而收藏的。其中一部就是先秦古文字体的《尚书》，计四十五篇。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